

第一章 世纪末的幽灵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已习惯于用倒数计时的方法来表达对于未来事物的企盼。在这个扳着手指头也能算清 21 世纪的来临还有多少个年头的时候，对于意气飞扬、迅速发展着的古老中国来说，对于已将捏在手心里的希望攥得汗湿的 12 亿中国人来说，这种企盼尤为急迫。快快翻过 20 世纪这沉重的一页，翻过它前一个 50 年的离乱悲欢，翻出它后一个 50 年种下的、渐正萌芽的希望。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被形形色色的欲望和祈愿蒸腾得沸沸扬扬的喧嚣世界中，从某个角落里飘飘悠悠地传来一阵刺耳的不和谐音：“中国的成长与强大是这个世界的最大威胁。”

一个幽灵在游荡……

第一节 新“黄祸论”

1995年7月29日晨，英国伦敦大雾弥漫。此时，一份份封面色彩鲜艳的杂志正经过各大邮局和国际信息网络的通道，在邮差们清脆的摁门铃声中，在嗒嗒的键盘敲击声中穿过雾霾，传向全英国、全欧洲乃至全世界，世界上最为权威的时事政论刊物——《经济学家》杂志正在发放它7月份的最后一期。这本是日复一日极为平常的一幕，但这一次《经济学家》那色彩鲜艳的封面却极不寻常：封面正中是一支粗壮的握成拳头的巨手，牢牢地攥住了一面正飘扬着的红旗，右下方是一座东方风格的建筑物，正上方是大大的两个英文单词：遏制中国。那面红旗是中国人忠诚所系的五星红旗，那座建筑物是中国人心中的圣地——天安门……

短短三、四年弹指一挥间，从“中国威胁”论的蜚短流长到“遏制中国”的剑拔弩张，中国的国际形象面临歪曲和中伤……

▲ 空穴来风：“中国威胁论”的出笼

在国际舆论中喧嚣一时的所谓‘中国威胁论’的第一个音符究竟始于何时，出于何人之金口，用一句研究历史的行话来说，是“至今已不可考”。但早在 1991 年初对于所谓‘中国问题’的‘担忧’之言就已见诸一些西方国家的报端，被奉为“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们鼓动唇舌，表面上成了这一番言论的始作俑者。

1991 年 1 月 9 日，美国为数不多的几家大报之一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东南亚国家为防备中国而纷纷加强海上防御力量》的文章，声称由于中国海军于 1988 年从越南手中夺取了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中的几座岛屿并占领了七个小珊瑚礁后，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仿佛同时得到了一个无声的信号：中国正在加强其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于是乎各国纷纷亟整军备，加强海上防御力量，不惜将大把大把的钞票“扔进”水里，从西方国家购进各种先进的海军装备。同时，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日本也深感“不安”，因为南中国海是这个资源匮乏国家输入工业“血液”——石油及其他资源的生死攸关的海上“生命线”。

无独有偶，一年之后的 1992 年 1 月 3 日，美国另一家大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刊出了一篇发自泰国曼谷的记

者文章 其主题却与一年前的‘同类’有了一些不同——《东南亚人谋求美国作出安全保证》针对美军撤出在菲律宾的两个军事基地，文章作者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安全表示出极大的‘忧虑’认为中国正在‘作为一个海军强国而崛起’为此 亚太地区国际安全的前景令人‘忧心忡忡’而美国‘重返东南亚’正是使这一地区局势‘转危为安’的灵丹妙药。

仅仅两个星期以后 巴西的《圣保罗报》老调重弹 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将一个令人又敬又畏的名称给了中国：《作为 21 世纪的帝国——中国的崛起——中国正朝着没有民主或饥饿的混合经济的方向前进，并又能领导新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集团》。这一长串标题下面的内容也有了一些新的说法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 它认为由于‘苏联帝国’的崩溃 中国‘自动’成为了‘亚洲主要的军事强国’。在地缘上 中国与经济发展神速的几只‘亚洲虎’接壤 华裔企业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盟网’，因此 今后几年内亚洲经济发展的政治统一的巨大中心在‘地理上和人种上’都与中国接近 中国人能重温历史上‘中华帝国’的辉煌旧梦 在 21 世纪领导起一个新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集团，该集团将不会是纯正的西方的民主的品牌。

持相似论调的文章在这段时期内层出不穷，但它们依旧是从中国强大 争霸 威胁这一逻辑所作出的猜测和预计，毕竟还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证据。因此，一时间这番高论到也曲高和寡，应者寥寥，但信奉这条逻辑的却有那么一些人。

1992 年 2 月 25 日 中国政府颁布并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法》 密切注视着中国政府一举一动的西方新闻界如获至宝 从华盛顿到伦敦再到东京 舆论界像一锅沸腾的开

水被一种莫名的兴奋感烧灼得滋滋作响。与此同时，少数几个国家的军政要人和政策咨询机构也终于按捺不住，一头扎了进来，“中国威胁论”开始变得像模像样了。

这其中人云亦云、随波逐浪的言论和无足轻重的人物且不去说它，但有几个重量级的人物和几份颇有些分量的文章，却颇令人关注。

1992年5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发表讲话，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有5个“关注点”，即北朝鲜未来走向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共产党中国的发展、领土冲突、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等，而这些问题的控制与缓解必须在美国的干预和控制下才能妥善进行。因此，美国“不能削弱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7月14日，某国外交部长一席意味深长的谈话使四座皆惊。他断言“中国正在东南亚‘显示力量’，因为‘中国沉睡了很长时间，现在它醒过来了’，而且由于有着‘不可回避的地理问题’，由于中国与日本之间恩怨难明、爱憎交织，东南亚国家则被夹在了中间，无所适从。随着美国人的撤出，中日之间的敌意可能增加，北京随即加强了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不知所措的东盟各国欢迎‘美国军队继续留在东南亚’，因为它们担心‘有人会来填补真空’，虽然‘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东南亚国家不喜欢受任何人主宰’，但毕竟‘对付已知的比对付不可知的更好办一些’。其已知与不可知的谜语实有所指，谜底昭然若揭。

此时，在西方国家外交政策制订中起重要作用的、被称为决策者“外脑”的政策咨询机构，也正式加入了这场舆论大合

唱。由于这些政策咨询机构提出的报告对于西方外交政策走向有巨大影响，且大都由从事国际关系及外交政策研究的专家撰写，故而其逻辑性、理论性和对外交政策制订的指示性都极强，因此这些大手笔就倍受世人关注，将原本就喧腾不已的舆论加热到了沸点。

1992年10月15日美国著名的传统基金会刊物《政策研究》刊登了曾任驻北京记者、现任费城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协调员罗斯·芒罗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一时间本名不见经传的芒罗和他这篇“危险”的文章一道登时声名显赫起来，一时风靡太平洋东岸。

在这篇洋洋万言的奇文中，芒罗先生充分展现出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中国异乎寻常的关心，他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入手，侃侃而谈，论述了中国对亚洲和平与美国利益所构成的“威胁”，并以此警示美国政府防范这个远隔重洋的“充满活力、热气腾腾的国家”。奇文共赏析 现将其摘要如下，以飨读者，否则不足以告慰芒罗先生的苦心孤诣：

自拿破仑以来，西方人一直在预言，一旦中国龙觉醒，全世界将为之震惊。在经过几乎一个世纪的起步生涯以后，看来中国终于坚实地走上了一条经济飞速发展、军事上显示其锋芒的道路，而这的确将在整个亚洲和全世界引起反响。

以下是一连串对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的溢美之词。

谈到这里，恐怕没有人会怀疑这位前往北京记者对中国的关切几乎是善意的。中国的成长和强大确乎是对中国人民蓬勃旺盛的创造力、中华民族的智慧勤劳和现行各项政策的英明和正确的一种直接肯定。这样的一路褒扬下去肯定会让善良的中国人耳根发软，几乎要怀疑起芒罗先生的国籍或血统来了。

但接下来，芒罗先生笔锋一转，言词之间渐露峥嵘：

近来，无论从相对的和绝对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军事实力一直在迅速增长。由于苏联的垮台和和平主义情绪在日本占上风，中国几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没有面临严重的地区性威胁，……尽管这样，自1989年以来，北京已把它的军事开支增加了50%以上。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还用于使中国武装部队获得在它的边境以外进行大规模冲突并取得胜利的能力。

至此，芒罗先生结束了他精彩的开篇词，在他笔下的中国已是一个正准备将手伸进别人的钱袋里为“富”不仁的暴发户形象了。

如果认为这种先扬后抑的捧杀伎俩就是芒罗先生的全套家底，那么也太低估芒罗先生了。在紧接着的论证中，芒罗先生旁征博引，指东打西，光是一连串独出心裁的小标题就足以令人为之倾倒：“60个新台湾”、“列宁主义的政治 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动”、“华盛顿不知所措”。

“长期的危险：中国的扩张主义”等等。

在有关“60个新台湾”的丰富想象中，芒罗先生扳着指头算了一笔细帐：“美国同中国的贸易逆差在80年代末还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去年却已达到130亿美元，今年预计将接近2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同日本的贸易逆差。”言下之意，在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在正常的经济交往中，美国方面竟是吃了不小的亏，而且正越来越吃亏。当然，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子民，芒罗先生绝不是心胸狭隘之辈，他还是宽宏大量地表示：“中国市场的发展扩大，对美国出口商来说当然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但这种慷慨之后的酸涩心态仍无法抑制，只是无法尽情渲泄，只好转而自怨自艾起来：“然而美国决策者们对于怎样同世界上第一个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共产党国家打交道一无所知，我们的贸易谈判代表把中国仅仅当作又一个迅速发展的亚洲虎看待”，而“极少去考虑中国的发展对于美国，更不用说对于世界贸易将会产生的令人吃惊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国不久可能成为像台湾那么经济富有活力的‘国家’，然而它的幅员相当于台湾的60倍”。因此，做一个简单的乘法算式便可得出答案，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冲击力等于“60个新台湾”。

令芒罗先生深感忧虑的还远不止于此，因为除了他之外，就连“华盛顿（政府）也没有认识到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的影响”，而“中国的相对的和绝对的军事实力突然增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国与它在亚洲世界最好的朋友的安全关系”因此，“所有这些国家都急切盼望美国保持它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并通过某种办法保护它们不受中国的侵害”。短

短几分钟内，在芒罗先生的奇思妙解之下，中国由一个“充满活力”令人钦佩的好汉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充满危险、令人憎厌的恶棍，而美国俨然成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侠仗义之士，正不辞辛劳地保护着受到侵扰的弱者，且正为此作出牺牲而任劳任怨。一幅多么悲壮的图景，一出多么绝妙的戏法！

使芒罗先生能够理直气壮地大声疾呼“中国威胁”的，是他认为有足够的事实证明他的担忧。用“事实”说话而不是捕风捉影、妄自猜测，也是芒罗先生远高于其同道之处。

让芒罗先生颇感兴趣的“事实”包括：

——“力争成为军事大国的新势头”：“中国与其邻国有关的军事力量突然增加了。自 1989 年以来，中国使其官方认可的军费开支增加了 52%。增加的军费在很大程度上用于加强军事力量、旨在使中国具有第一流的把其海上和空中力量远远投送到超越其海岸线以外的能力。”并且“中国不仅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而且还购买为建设国家所需的现代化技术。它最近购买了 24 架苏—27 作战飞机，……还想再购买……，正在同苏联人谈判购买……，进行了一次规模最大的核试验……。”

——“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动”：“1974 年，中国军队把越南军队赶出了他们所占领的岛屿，1988 年，再次把他们赶了出去。”……“5 月份，中国使越南蒙受了耻辱”，……“7 月份，中国进一步使越

南蒙受耻辱……”；北京声称整个南中国海是中国的领土，这在法律上和历史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将会“侵犯美国的切身利益”。

首先，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军事行动，“那就会侵犯美国的切身利益”，因为对美国来说，南中国海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联络通道而且肯定还会侵犯到日本……和东南亚本身。……如果出现上述情况，美国就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要么公然同中国相对抗要么完全从亚洲撤走”；一瘸一拐地越过太平洋返回夏威夷。”

其次从总体上来说，一个“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的和扩张主义的中国现在渐渐对美国基本的经济 and 战略利益提出重大的挑战”因此“，美中关系最大的问题既不是人权问题，也不是双边贸易问题，而是两国安全利益之间的基本冲突”对于美国来说它不得不被迫与“亚洲敌对的巨人相抗衡”来进行一场“老式的双方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

在这篇奇文的最后，芒罗先生为美国政府重新调整其亚洲政策出谋划策可谓殚精竭虑。奇计有二，一是“设法加强同日本、台湾和东南亚等老朋友之间现有的军事联系”，并在尽可能的条件下，拉亚洲的另一个大国、处于中国地理侧翼的印度和处于另一侧翼的统一后的朝鲜（韩国）入伙，站在美国一边“，以便同中国相抗衡”。

奇计之二是美国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十分小心谨慎地驾驭这个中国崛起后的新亚洲”，一方面尽力避免因在亚洲

卷入过深而陷入泥沼，重蹈越南战争时不能自拔的覆辙，另一方面又要在与中国的相互关系中，软硬兼施，打拉结合，迫使中国按照美国的设想，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美国人精心导演出来的固定的角色。一言以蔽之，要起到“平衡”中国的作用。

但这种“平衡”已经在中国人心中造成了不平衡。就在芒罗的文章在太平洋彼岸炸响后不几天，中国的一些有关的专家学者对此做出了较为强烈的反应，纷纷撰文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新闻界和知识界于此时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是与世界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的主流相悖的一股逆流，是极为不合时宜的，其实质就是在政治上阻碍“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的成功和日益扩大的影响，在外交上离间中国和邻国的关系 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牵制中国的发展 以便从中渔利。中国政府对此保持了极为克制的态度，并未在官方立场上作出任何过激的反应。在中国学者有理有据的反驳下，在中国政府的高姿态面前，芒罗们自觉无趣，同时手中也没有什么可以再搬出来舞弄的“事实”，除了偶尔的几下有气无力的重弹老调还不时响起外，“中国威胁论”的声浪已渐渐低落下去 暂时偃旗息鼓了。芒罗先生的大作高屋建瓴，一时也无人出其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95 年上半年。

但风既已起于青萍之末，便绝不甘于只吹皱一池春水，在头撞南墙之前，它免不了还要纵横恣肆一番。

▲ 从“中国威胁论”到“遏制中国”

公元 1995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按照中国的传统历法——夏历的计算，这一年有两个八月出现，这不仅意味着有一个漫长、燥热的酷暑要煎熬着中国人，而且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中国传统思想来看，天兆异象，必有异人出世，必有异事发生。

果真如此。

这异人异事都首先出现在面积近 3.6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2100 万的中国台湾岛上。

地处亚热带的台湾岛本就春短夏长，但 1995 年的夏天在这异人异事的刺激下，似乎来得更早。先是一位唤作郑浪平的先生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九九五年闰八月》的书，在岛内掀起了第一股热浪。郑先生的书以“通俗小说加科幻的笔法”，推断中国大陆会在 1995 年中至 1996 年台湾第一任“直选总统”就职之时，对台湾发动名为“T 日行动”的武装进攻，进而占领台湾。郑先生想象之丰富、文笔之精妙姑且不论，岛上居民的不安情绪却因之急剧增长。短短几天时间内，在此书畅销于岛内的同时，台湾股市行情却一跌再跌，直跌到了自 1993 年以来的最低点。民意调查也表明，有 1/10 的居民希望能离开台湾岛，以躲避“T 日”。

也许仅是巧合，恰在此时，台湾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先生

与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异常亲热起来，以探访母校——美国康乃尔大学为名，要求美方给他发放签证，以实现他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的“殷殷心愿”。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内政。在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中，能否正确地处理与台湾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政府衡量和评价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国政府也在各种场合多次表明了将统一祖国作为内政外交的主要目标的决心。中美之间于 1972 年打开彼此封闭的大门而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正是在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只有一个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台湾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尽管从那以后的中美关系风风雨雨、波澜起伏，尤其在台湾问题上双方时有争执，但两国政府还是在处理此问题上达成了一些默契。美国政府不接受台湾领导人的访问要求便是其中之一。

一开始，美国人对李登辉要求访美一事的态度暧昧不明，继而在国会山、政府内和舆论界就此事展开了争吵。鉴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灵活性”的了解和以往的经验，中国政府预先就此事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希望美国政府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规定的内容，拒绝李登辉的无理要求。

在中国政府的严正要求下，美国国务院和总统克林顿都先后作出承诺，表示将拒绝李登辉的访美要求。一场风波眼看就要平息，转眼间却又风云突变，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先生们开始向美国行政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其改变初衷。位居九五之尊，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拥有莫大权力的克林顿竟很快“屈服”

于这种压力 迅速地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李登辉也因此挤进了康乃尔 贩卖起‘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谬论，一路招摇而去。在这件事上，美国政府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其在外交政策上的“灵活性”。

中国政府对此的愤慨是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的。为向世人昭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外交上反击‘台湾独立’和‘拓展生存空间的台湾务实外交’等荒谬言行 另一方面结合现代化的需要 决定于 1995 年 7 月起在台湾海峡举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这完全是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所必需的行动。

这一举动却触及了某些人敏感的神经，“‘T 日行动’仿佛已从科幻小说变成了现实；‘扩张主义’、‘穷兵黩武’的中国已经‘原形毕露’了。有了可以现炒现卖的‘事实证据’的‘中国威胁论’者们重又抖擞起精神 调琴鼓瑟 再续前曲。

从 1995 年 7 月至 1996 年 3 月，随着中国在台湾海峡军事演习的继续，“中国威胁论”几经拨弄 调门一再升高 终于奏出了‘遏制中国’的最高音阶。

“遏制”一词实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史中出现的新名词 具有其特定的含义。了解历史、关注时事的人们大都知道 本世纪 40 年代中期那场空前大战的结束，并未自动地给饱受苦难的世界带来全面的、真正的和平。强权横行、大国争霸将世界引入了另一种性质的战争——全面的冷战之中，意识形态相对立、国家利益相冲突的美苏两强 在双方核力量保持大体均衡、都无须胜对方把握的情况下 不敢进行毁人毁己的正面军事交锋——“热战”而是以意识形态斗争、军备力

量竞赛、分化对方阵营为手段 发动了一场没有电光火炮、没有硝烟弥漫 但却同样是希图致对方于死地的战争。美国政府首先提出并积极施行的所谓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就是这场战争中鸣响的第一枪。

1946年2月22日 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拍发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报，文中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 其逻辑性、理论性和政策性都很强 堪称一时奇文。这份电报正中美国决策者下怀 当时的美国国务院为此还表扬了凯南，并将他破格提升为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进入了美国外交决策智囊团的第一梯队。凯南受此鼓励 更是思如泉涌 又草就一文 先是在美国决策层内部传阅，继而以《苏联行为的根源》为题 在美国权威性的外交刊物《外交季刊》上发表。至此 凯南成为当时杜鲁门政府外交决策的头号谋士，一整套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战略也因此留名史册。

星移斗转，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冷战格局已烟消云散 凯南先生尸骨已寒，“遏制”这个字眼却又被人从历史的角落里重新翻拣出来，当作了对付中国的如意法器。

前述《经济学家》上的《遏制中国》一文 将“中国威胁论”唱到了最高声部 因而不愧为集大成者 其奇妙之处堪与凯南之奇文相媲美。将两奇相对照，尽可窥知这些奇妙之处。

在凯南的笔下 苏联是一个“听不进理智的逻辑 但对武力的逻辑却十分敏感”的横暴的国家 它将在“一切认为合乎时机和会有好结果的地方 作出努力来推进 苏联 政权的正

式疆界”它“主要关注的是保证在世界权力的盆地中把它所能达到的每个角落和空隙都灌满它的流水”，“只有当它遇到无法对付的力量时才停下来”，因此，由于苏联扩张主义的本性难移，“美国不可能指望在可预见的将来，同苏联政权享有政治上的亲善关系”必须“把苏联看作是对手而不是伙伴”，但由于苏联对“武力的逻辑”的敏感性因此“如果美国”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只需“灵活而警惕地运用对抗力量加以遏制”就可以最终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凯南的两篇奇文为美国杜鲁门政府已经采用的对苏强硬政策提供了“完美的逻辑依据”从国家外交战略的高度为“遏制”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石。既已“解放了思想”美国的“遏制”政策便也从容行事毫无阻碍以至于当1989年苏东解体以后在西方一片“冷战胜利”的欢呼声中有不少人追忆凯南的功德将他奉为冷战功臣。

而在《经济学家》的“遏制”一文中作者虽无凯南那样的外交家所独有的敏锐嗅觉和头脑，但作为欧美报界的一位著名专栏作家，其嘻笑怒骂、插科打诨却更见功力，而且从其思路和文笔中也不难窥见凯南式的风采。

“遏制中国”一文开宗明义，针对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有关美对华政策的注释——“我们的政策是接触不是遏制”以及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有关“如果你将中国作为一个敌人对待，中国就将是一个敌人”的说法，认为自从中国开始在台湾海峡举行导弹演习以后要想否认中国的“威胁”并进而否定对于“遏制中国”的政